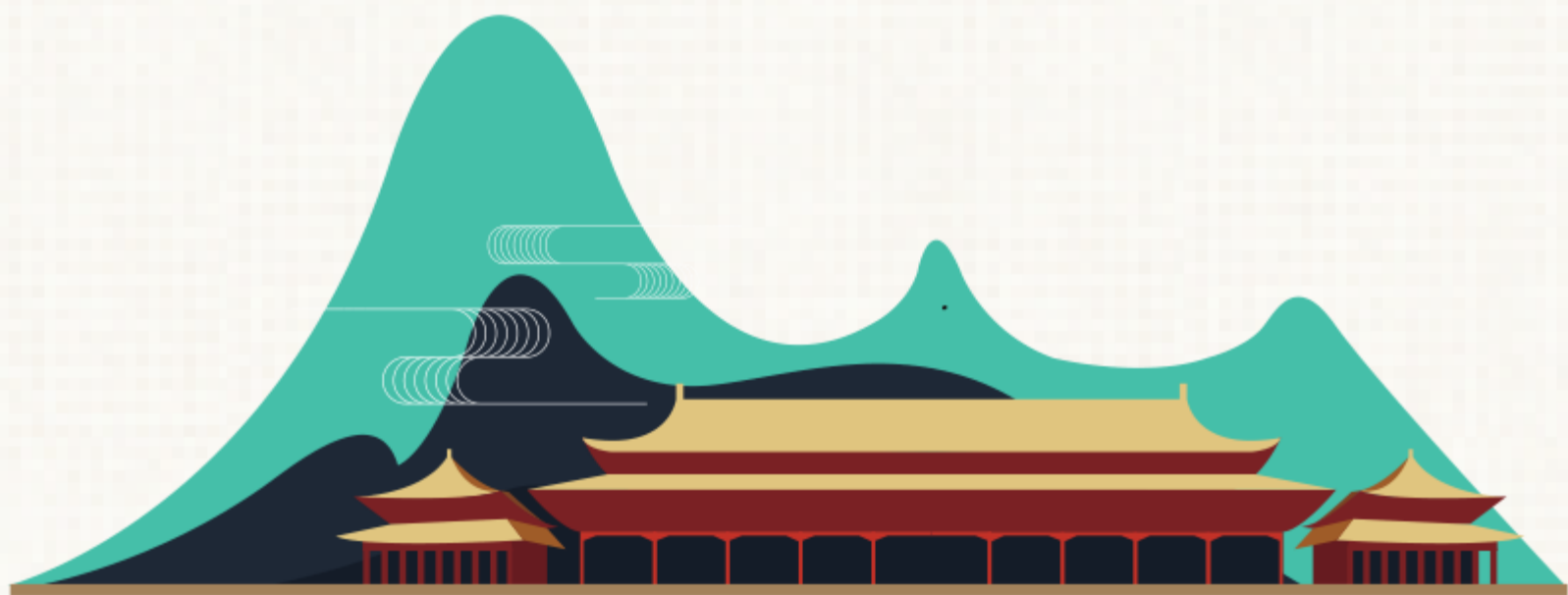


# 中国为什么成功

刘小军 著

—— 社会变革中的传统力量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刘小军 著

# 中国为什么成功

—— 社会变革中的传统力量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20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为什么成功：社会变革中的传统力量 / 刘小军  
著. — 厦门：鹭江出版社，2020. 11  
ISBN 978-7-5459-1818-2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95430 号

ZHONGGUO WEISHENME CHENGGONG

**中国为什么成功**

——社会变革中的传统力量

刘小军 著

---

出版发行：鹭江出版社

地 址：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361004

印 刷：福州星森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闽侯县青口镇东长路 8 号

电 话：0591-83910992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0.5

字 数：161 千字

版 次：2020 年 1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9-1818-2

定 价：4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题记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简单地引进所谓现代化因子，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与抓着自己的头发上天无异。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和运转了二千多年的国家，它的文化、社会形态、国家治理乃至成熟的文官系统和商人阶层，都为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工具。尽管一段时间，传统曾遭无情鞭挞，一些甚至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但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沉淀为民族记忆，从来不曾真正消失过，当新的历史重新启动时，它们又被唤醒。从传统中汲取资源，或许是这个国家成功的神奇密码。

当然，传统也有两面性，它在提供便宜性的同时，也制约着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它的发展，从这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也是对传统的“祛魅”化过程。



## 目 录

---

- 第一章 入世文化与世俗成就动机/1
- 第二章 从彼岸到此岸/4
- 第三章 转化之感/9
- 第四章 关系导向的行为模式/17
- 第五章 成熟的国家治理/30
- 第六章 传统商人与商人精神的滥觞/35
- 第七章 近代商人与早期现代化/45
- 第八章 艰难的起步/60
- 第九章 乡村的崛起/69
- 第十章 城市个体户的兴起/81
- 第十一章 国有企业的突围/94
- 第十二章 国企改革困境/103
- 第十三章 群星闪耀之时/112
- 第十四章 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125
- 第十五章 融入世界经济/140
- 结束语 重回舞台中央/160



## 第一章 入世文化与世俗成就动机

中国的入世文化，滥觞于周，集大成于春秋的孔子，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色。与商人敬鬼神的神权统治不同，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认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独有的神，而是天下各族共有的神；“天命”属于谁，就看谁有能使人民归顺的“德”。“上天”只会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佑，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

虽然周公的“以德配天”还未完全摆脱“君权神授”的观念，但他的关注点已从彼岸世界拉回了此岸世界，人和命运和国家前途不再取决于天，而在于自身，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重要转折，从此形成了与其他大多数民族完全不同的人世文化。

到了春秋，孔子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的观点，儒家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从修身开始，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道家看似虚玄，倡言“无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无不为”。法家文化一切以实效为依归，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没有把神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把人居于中心，入世文化使中国避免成为神权统治的国家，没有出现过教权乱政的情况，也没有因为宗教矛盾而导致战争和国家分裂。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没有祭司阶层，从而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及社会各阶层共奉的价值观。

与否定今生、注重来生不同，中国人始终强调现实人生。中国人在解决问题时，不过于求助巫术或神怪，而是立足于现实，在现实中寻找方法，这对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成功提供了可能。



这种理性文化，使得中国人天然信奉“工具合理性”。“工具合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概念，与之对应的是“价值合理性”，前者以结果是否达成目的为依据，达成就是合理的；后者则是以是否符合某种教义为判断依据。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破除“两个凡是”，提倡“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质就是向“工具合理性”的回归。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的诉求点主要是民风教化和治国安邦，但作为中国文化的子系统，中国的商业文化自然也被深深地打上儒家的烙印，正是这种入世文化，形成了中国人强烈的世俗成就动机和与之相匹配的勤劳、节俭的优良品德。

中国人把追求世俗成功当作成功的标志，这种世俗成功，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并不必然表现为商业上的成功；相反，仕途成功更是社会主流。但是，当商业社会来临，比如明末，仕途成功不再是唯一，当金钱成为评判成功的标志时，这种成功动机就迸发出强大生命力，从仕途转向商业，要远比从彼岸转向此岸容易得多。

中国的入世文化使得中国人在进入商业社会时，无须像西方那样需要变革，把对彼岸的关注拉回到对此岸的关注。西方的宗教改革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其核心就是把彼岸与此岸做了关联，从而把人的目光从彼岸拉回此岸，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这点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是做了说明。而更多国家或民族，由于无法在文化和宗教上进行变革，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莱兰在研究各国发展时，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是资源、环境等外在的东西，而是一个国家社会成员的成就动机，这种成就动机落在商业上，就形成了所谓创业精神。

从漫长的农业社会到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国人始终保持强烈的成就动机，除了长期生存艰难、祸患不断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外，还和中国独有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密切关系。

传统中国，人是家族中的一员，家族之间既守望相助，也互相攀比，甚至竞争。家族对成员的最高期望就是望子成龙、光宗耀祖，而



家族也为成员子弟提供必要的条件，在这种氛围下，每个成员也与生俱来地带有强烈的成功使命，意图光耀门楣。

在中国，宗教对人们的约束有限，大多数人也不信教，约束中国人行为的主要是儒家教义。但儒家不是宗教，对人并没有强制性，它本身也是世俗的而不是先验的，它不仅没有约束人们对世俗成功的追求，反而提供成就成功的动力。当然，儒家毕竟形成于农业社会，在商业社会不一定合适，比如对财富、商人的看法，它还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



## 第二章 从彼岸到此岸

不论何种现代化，其实现途径首先都必须把目光从对彼岸世界的关注拉回到此岸世界。一些文化对此进行了转化，一些则没有，即便实现了这种转化，也是历经了艰苦的过程和漫长的岁月。

从彼岸回到此岸，只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现代化的起点，有了这个起点，一个国家或民族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独有的商业精神，进而形成推动现代化的承载者——商人阶层，从而展开对现代化的追逐。

本章简要回顾西方与日本的现代化的精神历程，以便更好理解中国的现代化。

中世纪欧洲的基本经济形态是庄园制，庄园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商品交换保持着最低水平，社会流动处于停滞状态，基督教控制着人们的意识，商业行为被视为不道德的职业。尽管如此，由于庄园主对奢侈品和短缺品的需求，仍然保持着少量商业行为，对于处在边缘地带的，如偏居一隅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较少受庄园经济的影响和游离于欧洲主流社会的犹太商人——不受基督教的制约，即便是在欧洲最黑暗的中世纪，他们也在逐步发展中。<sup>①</sup>

商业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在商业中不占优势却有着传统手工业的佛罗伦萨，很快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商业的发展逐步瓦解了庄园经济的基础，固定的社会秩序开始松动，一批农民逐步摆脱庄园并投入商业活动中。

商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有了在固定场所交换的需求，于是集市开始形成，最终促成了城市的兴起。城市的兴起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

---

<sup>①</sup> 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 页。



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城市的发展，一个更为广大的阶层——市民阶层也随之产生。欧洲的城市一开始就是以商业为中心，以商人为主体的城市。

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商人阶层所需要的知识与传统农民完全不同。他们关注自身能力及对财富的追求，直接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产生了影响。<sup>①</sup> 文艺复兴最先出现于商业最为繁荣的意大利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这不是偶然的，文艺复兴对人的关注及倡导感官享受等充分体现了商人阶层的基本追求。

商人阶层与在观念上及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最大冲突在于财富观。中世纪基督教倡导的是禁欲主义，拥有财富是不道德的，正如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富人要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圣·伯尔拿说，“你只有蔑视财富，才能在天堂成为一个富有者”；托马斯·阿奎那也说，“甘愿贫穷是人们达到完美之爱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sup>②</sup>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商人对财富的追求受到极大限制。

如果说路德的宗教改革使人们在信仰方式上得到解脱的话，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则彻底解除了商人心灵上的枷锁。新教的核心是“命定说”，谁是上帝的选民抑或弃民，没有人可以帮你，教会也不行，只能靠自己在尘世中的勤勉努力来证明。于是，追求事业成功，包括在财富上的成功就不是自己的事，而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是人的天职。

天职观对西方商业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商业伦理、工作伦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过深刻的阐述。

禁锢商人心灵枷锁的枷锁被解除了，一个大胆追求财富的时代到来了，新教赋予了商人追求财富和事业成功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商人阶层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起来，最终推动了工商社会的到来。

---

<sup>①</sup> 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15 页。

<sup>②</sup> 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3 页。



一般的人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始于明治维新，但正如日本著名作家山本七平所认为的，正是因为德川时代所发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才“确立了日本现代化的自我秩序，……德川时代是一个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sup>①</sup> 在德川时代之前的长达 900 多年中，日本实行的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庄园制经济，庄园的土地及农民成为领主（大名）的私有财产，封建中央政权无法对庄园主所拥有的土地进行占有和调配，这和西方封建时期经济形态比较一致。<sup>②</sup> 德川家康掌权后，继续实行了丰臣秀吉的“检地”政策，实行“一地一作人”的土地制度，绵延数百年的领主庄园制宣告瓦解，货币地租开始出现，即一部分农民把土地转给别人耕作，收取地租。1872 年，明治政府宣布废除《田亩永代买卖之禁》，允许土地买卖，这样，不仅农民可以从土地中游离出来，土地本身也成为商品，这为日本商业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693 年，德川幕府实行“参勤交代制”，规定大名必须每年有几个月交替居住在德川幕府所在的首府中。当这些大名返回自己的封地时，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留下，这一措施使得沿途公路的商业发展起来，更使得江户商业繁荣，此外，还促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公路网的形成。到德川时代的最后 20 年，江户的规模已经像伦敦一样大，拥有 100 多万人口，大阪和京都也分别有 20 万和 30 万人。<sup>③</sup> 有关研究表明，在明治初年，日本 3300 多万人口中，从事工商杂业和为人佣工者共计 400 余万人，占总人数的 13%。<sup>④</sup> 值得一提的是，明治政权建立后，武士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大多生活陷入窘迫，武士阶层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服务，成为新式政治家或军人，一部分从事学术、教育、新闻等职业，成为新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则依靠政府所发的公债从事工商业。武士阶层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知识，他们的加入不仅改善了人们对商人的轻视，也提升了商

---

① 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82 页。

② 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31 页。

③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9 页。

④ 罗福惠：《国情、民性与近代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9 页。



人的整体素质。

商人阶层的形成及市民社会的兴起，意味着日本传统的农业社会正逐步向着工商社会转型，反映这一变化的新的观念也开始形成。

这一观念的转变首先是从对商人的重新认识开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所形成的观念以及统治阶级所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使社会充满了对商人的偏见，对商人的偏见不消除，将直接抑制日本工商社会的形成。

较早对这一现象发难的是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石田梅岩。石田梅岩从士农工商具有共同的“道”来说明商人的合理性。他写道：“商人之道岂异于士农之道哉？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士农工商皆为天所属，而天无二道。”<sup>①</sup> 他明确反驳人们对商人的攻击：“商人事买卖之业以利天下。工得其薪。农得其收入，正如士得其俸禄。苟天下无诸般产业，则天下何以存？故商人利乃无愧于天下之报酬也。汝谓贪念于买卖之利为无道，憎商人而拒绝与其交，何独视商人为下贱而恶之也乎？汝于今倡言不予商人以买卖之利，果不予其利，则天下之法亡矣。”<sup>②</sup>

这些启蒙思想家除了证明商人的合理性外，还从日本的文化 and 民族性出发，引申出日本商人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和工商伦理。

西方基督教新教之所以能够促使人们勤俭、敬业，是因为西方的“罪感”意识所带来的对来世的恐惧，使人们产生了内在的焦虑，促使其终生节俭、勤勉，以不断工作来洗脱“原罪”，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天职”伦理。

日本的内在精神动力和工商伦理是如何形成的呢？一般认为，日本的宗教信仰并不像西方那样强烈，但日本德川初期曹洞宗禅师铃木正三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在日本，‘日本没有宗教’的说法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误解，实际上仅仅是日本的宗教性与西欧不同而已。在日本，如果说不再信奉神，社会对此并不在意。但是，如果说不再信奉自己，他就会失去社会性的资格，信奉自己是指信奉自己内在于自身的佛，每一个日本人都具有这种意义上的宗教性。”<sup>③</sup> 铃木正三在

<sup>①②</sup> 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02 页。

<sup>③</sup> 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28 页。



他的著作《四民日用》提出了佛在各种世俗的事务中，“人人各守其业即可成佛，而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这是普遍适用于士农工商的一条重大原则，如果把世俗的行业视为佛，它就会成为宗教行为。”<sup>①</sup>

这样，铃木正三就把“勤”“俭”这一理念引入人们内心，形成一种有别于西方但同样能在内心引起焦虑的“天职”观，而这一“天职”观的形成又是与日本特有的文化相关的。

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把文化类型分为“罪的文化”与“耻的文化”。前者是欧美文化，后者是日本文化。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吉田松阴把“耻”说得比“罪”更严重，更能影响人的行为动机。<sup>②</sup>

松田吉阴把日本式“新教”情结归结为“耻”，人最大精神不安是“耻”。因此要免去对于“耻”的内心紧张。开出的药方是“勤”、“俭”和“工作”，这样工作就升到至高至圣的境界。<sup>③</sup>

“儒教”与神道教并用，结果很容易使“儒教”的某种理论与神道教糅合在一起，直接把市民的工商活动神圣化、宗教化。日本“勤劳报德”的思想一方面出自儒学，但因渗入偿报“神”之恩德的意义，便使其勤劳伦理自然转入宗教轨道。”<sup>④</sup> 这样，经过一批批启蒙思想家的不断努力，日本的商人精神逐步形成和确立。

---

① 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28 页。

②③ 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9 页。

④ 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0 页。



## 第三章 转化之感

幸运的是，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积极的入世文化，这使中国在进行现代商业时，无须经历痛苦艰危的文化转化。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皇权历史中，中国社会的商业始终没有中断过，这种传统商业文明为中国进入现代文明提供了现成的工具。

但从根本上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诞生在农业社会的土壤中的，而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对商业文化的压制和摧残，使得中国的商业文化带来先天的病根，这需要对包括传统商业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进而形成中国独有的商业精神和商人阶层。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南宋“除去军器之类不准私家生产，朝廷的几类专利品不准私卖外，一切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东西，只需交纳税款，百姓均可生产、贩卖。因此，民间不仅有各种手工业坊场，而且有比较普遍的发展。”<sup>①</sup>

宋朝商品经济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商业的高度发达，南宋的杭州“大小铺席皆生意兴隆，大商品贸易数额之大都是‘动以万计’，城内及郊区处处都有茶坊、酒肆、饭馆、各种点心果脯零食的店铺摊贩，以及买卖日用什物和珍奇玩好的商店、作坊店铺、‘浮浦’、小贩等等。买卖日夜不绝，各处的夜市、早市等都极其繁华热闹。城市中除普通商店外，有种类繁多的作坊店铺，贩卖自己生产的形形色色的

---

<sup>①</sup> 刘春萍：《南宋商品经济发达原因》《探求学刊》，1995年5月，第91页。



商品。这种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现时的拂晓时辰’。”<sup>①</sup> 宋代商税在封建财政收入中已占相当的比重，有“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之说。<sup>②</sup>

宋代的城市化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速发展。

明朝晚期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明代中叶，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田赋、力役的折银，出现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原料和手工业品生产的地域分工趋势。如江南湖州（今属浙江）普遍种桑养蚕，山东、河南广泛种植棉花，苏州、杭州等地成为丝织业生产中心，松江（今属上海）地区则是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在生产组织上，苏州、松江等地甚至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机房”，即手工工场。这就促进了各地区间的商品交换。

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全国各地有许多商人和商业资本集团，最著名的有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及关陕商等。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明中期以后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当时的北京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广州、泉州、漳州、福州、宁波等地是对外贸易港口；武昌、荆州（今湖北江陵）、天津、临清及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贸易中心。当时还产生了五大手工业区域：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芜湖（今属安徽）的浆染业，铅山（今江西铅山南）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南方地区，市镇迅猛发展，特

---

<sup>①</sup>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3 页。

<sup>②</sup>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12 页。



别是长江三角洲，除了苏、杭、湖、嘉、松等最繁荣的城市外，又涌现出大批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镇、嘉兴的濮院镇和松江的枫泾镇等。

明中叶以后白银的广泛使用，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例证。

值得重视的是，明朝，尤其是晚明不仅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明朝的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晚明社会变迁包含着诸多方面。在乡村，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增长，赋役货币化，冲击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化，社会分工扩大，社会分化加剧，形成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在城市，工商业城镇兴起，劳动力市场出现，手工业发展，出现新型手工业工场，商业繁荣，商品经济极大地增长；旧的等级制逐渐分解，出现新的社会分层；商帮崛起，商人定居化增多，不仅促使全国性市场网络形成，而且导致社会价值观念重塑，社会整体趋向商业化。<sup>①</sup>

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如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认为：至18世纪以前，在“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方面，中国经济制度与欧洲并没有根本的区别。<sup>②</sup>

到了清代，尤其是晚清，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工商社会的发展改变了自身演进的轨迹。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成为促使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催化剂：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凭借从中国取得的一系列特权，大量对中国输出商品，使中国日益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随之造成中国城乡手工业逐渐衰落，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同时也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市场和劳动力；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后，外商陆续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受其刺激，中国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中国产生了资

---

<sup>①</sup>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月，第3页。

<sup>②</sup> [美] 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本主义企业及资产阶级。

尽管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了“扶本抑末”的政策，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人阶层的形成不能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产生影响。早在12世纪南宋时期，思想家陈亮便提出了“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终处，便是有理”。陈亮强调以“功事”计“德、理”的新义理观，对于轻贱商业的旧传统的精神无疑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他说，“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互补，而非求以相病”。

而明朝的哲学家王阳明则走得更远。他提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肯定士、农、工、商在“道”的面前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更不复有高下之分。新安的商人汪道昆甚至喊出了“良贾何负闾儒！”这在当时可谓“惊天动地”。

沈垚认为治生为商并非损人利己，而是互通有无“人已皆给”的互利活动，他强调社会离不开商人，应予以应有地位。他甚至鼓动儒者经商，认为以商养学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更可贵的是，沈还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思想。

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重商的意识在统治集团中也有所体现，明嘉靖、万历期间，政治家张居正就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穡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

至于民间，重商风气同样也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一些商业发达的地区，如江浙、安徽、山西等地，学而优则仕本是几千年来大部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这一观念也受无情冲击。乾隆年间太谷县一个举人出身的刘大鹏写的《退想斋日记》提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重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当地也有“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的童谣。在山西人看来，经商是一种比读书做官都重要的事情。山西巡抚刘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雍正皇帝在上面朱批道：“山西人，第一类是经商的，第二类是务农的，第三